



毛泽东思想 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曹 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 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曹 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自 序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前半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一是后半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本专著着重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

专著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萌芽、初步形成、形成、系统形成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导、功绩、失误的内在联系,以论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第二部分,论述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基本理论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以论证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历史经验。这两部分都首先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客观历史过程出发,探求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结论。第三部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系统形成的内在条件以及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因素,以论证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第四部分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以论证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五

部分,论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结论,摘录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基本线索和主要资料,以便说明成书过程和主要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概要》(1989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问题》(1991年),这两本专著基本反映了在这一领域我学习、教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所以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共产国际关系诸问题时,除有关的重大“史记”外,有关的历史过程就不再论及了。

由于本人学识和掌握资料的局限性,在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只是划了个粗线条,遗漏甚至错误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同行及读者指正。

最后,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董修荣,北京大学教授向青;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王敏以及于瑞武、曹海轶、曹海琿等同志的指导和协助。

作 者

1995年11月1日

目 录

自 序	(1)
-----------	-------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斯大林共产国际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	(1)
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与共产国际	(19)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共产国际	(39)
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与共产国际	(54)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与共产国际

毛泽东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与共产国际	(79)
毛泽东党的思想建设理论与共产国际	(101)
毛泽东党的作风建设理论与共产国际	(122)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共产国际	(138)
毛泽东武装斗争理论与共产国际	(165)

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与延安时期

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与延安时期的历史特点	(184)
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204)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的标志、内容和意义	(225)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历史地位	(233)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体系的特色	(24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265)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纪事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述要	(286)
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 关系纪事	(297)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纪事 ...	(317)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纪事	(343)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

● ●

~~~~~

~~~~~

~~~~~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从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萌芽。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共产国际有过相同和不同的认识。一般地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指导上发生了失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就是在

• 此文提纲发表在 1993 年第 9 期《理论导刊》上，此次全文发表。

吸取其正确部分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的认识,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尽管还不够完善,但毕竟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性质问题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早在1922年1月,《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部分内容第一次被译成中文登载在《先驱》杂志上。同时,在列宁的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指南,分析了远东各国及中国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国内革命势力,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正是这次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改变了以往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过去曾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而“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还认为“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并强调

“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①。

共产国际还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1922年4月，《先驱》登载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②。

中国共产党依据上述精神，“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情形”，以“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召开了党的“二大”。

1922年7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大会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精神，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时，大会宣言指出：经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经济“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管理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总之，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08、207页。

② 《先驱》第4号。

③ 《先驱》“创刊号”。

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管理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在分析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时,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要奋斗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第二步是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宣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党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解放”;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民主革命的纲领^①。

可以看出,党的“二大”依据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初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识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它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个革命纲领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和结果,它标志着民主革命基本思想开始产生,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萌芽。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的影响已超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主席团委员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决策大多直接来源于斯大林的理论 and 思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67、72、76—78页。

想。

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以及“因军阀和官吏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①决定的。因此，他明确的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②。为此，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六大”时，关于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关系问题，曾经有过争议。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六大”时，“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六大”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④。可见，斯大林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和革命性

① ②③《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99、260、261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8页。

质的理论是正确的,这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产生和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是有直接影响的,也就是说,直接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指导。

二、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共产国际和马林通过党的“二大”、“三大”,帮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从讲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到讲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渐进的过程。共产国际讲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潜在的、将来的事情,而不是当时实际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受其影响的,但毛泽东等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①。这里讲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条件,如果无产阶级连独立性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领导权。后来,在列宁同意的《补充提纲》中,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出发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做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关键来看待。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275页。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制定的《东方问题提纲》,强调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也强调了反帝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但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只是提到“把当地无产阶级锻炼成为政治领袖”。“在斗争中……才能把自己提到斗争领袖的地位”。可见,共产国际只是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做为发展趋向提出来的。

1923年5月,共产国际作出《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提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①,但这个指示几经辗转,中共“三大”结束后,7月18日才收到。

6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认为必须坚持党的独立性。但马林和陈独秀存在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说明共产党要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是不明确的。因此,这次大会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反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

1924年6月,李大钊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强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工人阶级政党的的重要性,提出共产国际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使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他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参加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我们参加该党的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他十分明确的强调,“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8、7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

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一支革命的先锋队”^①。这个认识是比较具体的,但又是从“策略”角度、从今后的努力方向讲的。1924年11月,邓中夏最早提出民主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②。这应该说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

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据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飞跃。可惜,毛泽东当时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他的思想没有成为党的认识。但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明显表现。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并帮助起草了决议。大会的各项决议都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个认识是一大进步,在以后的实践中,尽管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但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土地革命的领导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等重要问题上确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从共产国际的角度讲,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潜在的和将来的事情。特别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反帝性质,强调组织群众运动。他认为“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意义,即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

① 《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② 《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放在领导群众运动的位置上,把领导权划在政治宣传,发动群众运动这样的范围内,实际上忽视了对政权、军权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掌握。

周恩来指出:“在领导权问题上,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并且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①。这与共产国际是有关系的,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体会议上的殖民地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它不是象纯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甚至也不象革命前的俄国那样,而是通过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和急进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党这个媒介来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实际上是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七次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这个原则是对的,但在实际政策上,斯大林却把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把蒋介石作为“目前确实在进行反帝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力量”的中间派,把汪精卫作为“代表中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分子”,而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政变后,中共五大再次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5页。

提出领导权问题,但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5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八次全会。会议期间,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重要指示,阐述了共产国际在武汉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策。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7万军队,其中包括2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但对避免大革命的失败为时已晚。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三、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共产国际看重资产阶级,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这种认识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缺乏具体的国情分析和阶级分析,把资产阶级看成铁板一块。毛泽东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吸取以往认识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论点。为以后毛泽东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及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1923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的中共“三大”所做的决议案中,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人(即财阀)和中产阶级。决议案指出:大商人和官僚一样是趁火打劫的,而中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大多数的中产

阶级”受政治上的压迫。统治中国的“不是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苟且偷安”，“依靠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

陈独秀在大革命初期写的文章中，如《中国论》（1922年9月），《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等文章中，把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指出，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由于企业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阻碍而赞成革命；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而反对革命；小工商业资本家由于企业规模小，受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而对革命恒取中立或趋向革命。但由于陈独秀受共产国际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影响，对资产阶级，主要是对新兴工商业资本家阶级的动摇、妥协、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一面，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从总体的估计上，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强，因此，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并由此得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结论，成为他以后犯右倾错误的主要思想理论根源。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刊物上首次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1月和3月，又分别在《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上两次重新发表此文。在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也就是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澄清了过去对资产阶级的种种含糊不清的观点和概念。

文章在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买办阶级和军阀、官僚、